

香港傳真

中信泰富政治及經濟研究部
中國稅務雜誌社綜合研究組

No. 2005-66

2005年12月23日

極高明而道中庸

軍事科學院政委 劉源¹

這本書原來是電視理論系列片的解說詞。一個整體謀篇佈局，文字表述，不能不跟著被採訪人的口述和鏡頭畫面走。2002年電視片製作完成之後，本書文字經過多次修改，又與原稿有了許多差別。

按本意，是想以通俗易懂的方式，探討建設新中國的理論問題。為了這個探討，1969年，父親被關押迫害致死，全家飽受磨難。作為後代親人，很難做到視角絕對不失偏頗，筆端完全不帶感情。始料不及的是，電視片和劇本在小範圍徵求意見，各種反饋極其強烈，令人感動不已。“死而不亡者壽”。30多年時間過

¹ 本文是劉源著《劉少奇與新中國》一書寫〈作者的話〉，寫於2005年10月1日，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56週年。《劉少奇與新中國》一書並十集電視理論系列片光盤，由香港大風出版社2005年12月出版。

去，不同角度的強烈反響，使我再次清楚地認識到，老一輩全身心投入的偉大實踐，屬於中國共產黨，屬於經歷過反右、大躍進、四清、文化大革命和改革開放的中國人民。書中涉及一些重大理論問題，具有迫切的現實意義。為此，就出版之際，補充幾點意見。

一、捲旗不繳槍

王小強說，“捲旗不繳槍”是鄧英淘對改革開放的經典概括。

在建國以前的歷史上，毛澤東和劉少奇在黨內的形象一直偏“右”。在“左”傾路線使革命事業遭受巨大損失的時候，毛、劉兩人分別吃盡了被左派鬥爭的苦頭。在黨內長期政治鬥爭中，毛、劉結合成紅區、白區正確路線的代表，包括劉少奇在“七大”概括的“毛澤東思想”精髓，都是堅持表面上貌似偏“右”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。毛澤東思想成為全黨的統一思想，在意識形態上，擺脫蘇聯指手畫腳；在統一戰線中，打破國民黨政府“一個主義、一個政黨、一個領袖”的束縛；² 為日後三年內戰推翻美帝全力扶持的蔣家王朝，建立新中國，奠定了勝利的基礎。

值得強調指出，這個實事求是的“右”，不僅與言必稱馬列的“左”相對立，而且與陳獨秀、王明繳械投降的機會主義，具有本質區別。1927年寧漢分裂，為了團結汪精衛堅決反蔣，舒緩對共產黨的戒心，陳獨秀命令劉少奇將武漢三千工人武裝解散或

² 開羅會議，中國名列“世界四強”，廢除滿清簽訂的不平等條約，全民統一抗戰。蘇聯希望中國抗戰拖住日本，王明提出“一切服從統一戰線”。國民黨針對共產黨的獨立自主，以及其他民主黨派發展，提出“一個主義（三民主義）、一個政黨（國民黨）、一個領袖（蔣總裁）”。

交給國民黨左派政府。劉少奇不同意，又必須執行，結果交了幾條破槍敷衍了事，精銳部隊連人帶槍，送到賀龍和葉挺的部隊，成為後來南昌起義的主要力量。這件事的處理，表現出劉少奇之“右”，與陳獨秀之右的原則區別——捲旗不繳槍。

抗日戰爭期間，紅軍改編成八路軍，應當是捲旗不繳槍的經典之作。從形態上說，紅軍與白匪殺得血海深仇，摘下紅五星、紅領章，換上青天白日滿地紅，“出賣原則”再過分也不過如此。把古人說的“反經合道為權”，用到了極致！事情做到如此程度，一片“蔣委員長萬歲”的歡呼聲中，毛澤東也罷，蔣介石也罷，誰對誰都不可能再存有一絲一毫的幻想了。“右”得無以復加，體現出“左”得無比堅定。這就是辯證法，也是產生“61個叛徒集團”的路線背景。相比之下，韓信的胯下之辱，劉邦的“分一杯羹”，簡直是不值一提的小兒科了。

毛、劉絕不投降的堅定信仰，建國之後，在探索如何建設社會主義新中國的進程中，面對一系列新問題，黨內黨外新的各種意見的“左右”之爭。張春橋概括修正主義有“兩個投降”：在國際上向帝國主義投降，在國內向資產階級投降。毛澤東高舉繼續革命的大旗，反右而後大躍進，“四清”而後文化大革命，最後仍然得面對現實，“抓革命促生產”，起用鄧小平，歡迎尼克松。三年困難時期，劉少奇大力推行“三自一包”，經濟剛剛恢復，馬上發動“四清”運動。在“一大二公”、普遍饑荒的農村基層引進市場機制，許多幹部多吃多佔，以權謀私，脫離群眾，作威作福。“桃園經驗”證明，一般的調查研究不夠了。經歷了一系列政治運動，弄虛作假成風，有當地官員前簇後擁，老百姓不敢說實話。必須背靠背“扎根串聯”，才能解除群眾顧慮，瞭解真實情況。不論從現象還是程度上，那時的“多吃多佔”比起

今日之腐敗蔓延，恐怕是小巫見大魔了。同樣道理，今天恐怕連“扎根串聯”都不夠了，祇有深入持久的民主法制，才能約束執政黨幹部以權謀私。同樣出於對貪官污吏的深惡痛絕，毛澤東當時得出判斷，資本主義復辟很容易，根子在黨內的“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”，必須全面發動群眾造反的大民主。

一意孤行的理想追求也好，死不悔改的實事求是也好，同源於一個無比堅定的政治信仰。毛澤東的理想追求，更多基於農業社會主義的深厚土壤，政治鬥爭不擇手段。從為人民服務的願望出發，搞到發生大面積餓死人的慘劇，無論如何不能說服人。劉少奇的實事求是，更多來自一線工作的具體實踐，經濟要運轉，人民要吃飯，大躍進、文化大革命都無法改變這個基本事實。但是，從劉少奇對幹部欺壓百姓的疾言厲色，從劉少奇發動和領導的“四清”運動，從建國以後劉少奇一次又一次真誠檢討“右”，一次又一次真誠希望跟上毛澤東，可以清楚地看出劉少奇實事求是的所謂“退”、所謂“退夠”，與國際上向帝國主義投降、國內向資產階級投降，不可同日而語。務實而求真。劉少奇堅持的實事求是，仍然是“捲旗不繳槍”的堅定政治信仰。正是因為不僅理解而且認同毛澤東鮮明的愛憎，為人民謀利益的急迫心情，才能理解為什麼劉少奇從來不反毛澤東；才能理解黨內高級幹部對不正常的家長作風、理想主義的浪漫激進，為什麼一再遷就、退讓、姑息，直至釀成文化大革命。

二、兩手都要硬

毛澤東去世以後，鄧小平改革開放。近30年時間，中國經濟持續高速增長，一部分人先富起來，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。與此同時，貧富分化、物慾橫流、貪腐遍地、犯罪猖獗、崇尚利己、

信仰危機，帝國主義張牙舞爪，分裂勢力明火執仗。“六四”風波創巨痛深，黃賭毒黑變本加厲，法輪功呼風喚雨，陳水扁沐猴而冠，似曾相識的內憂外患紛來沓至。屬於“黨和國家領導人”的成克傑，居然成了十惡不赦的貪污犯，問題的性質似乎已經超出簡單的反腐敗範疇。無庸諱言，當年毛澤東不擇手段所要防止的資本主義復辟，許多現象已經預言式的出現了。

早在改革開放之初，1979年，鄧小平提出“四個堅持”的政治原則，當時針對的是徹底否定建國以後毛澤東思想的潮流。接著，鄧小平又先後提出“清除精神污染”和“兩手都要硬”。有多硬？連“黨和國家領導人（成克傑）”都槍斃，還能怎麼硬？難道祇能“寧要社會主義的草，不要資本主義的苗”，回到文化大革命“造反有理”，全國人民都穿清一色的藍制服，祇看八個樣板戲，農村三分之一人口餓飯，城裡人吃飯穿衣憑票限量供應，粗糧細米、肉蛋禽魚、油奶醬茶、黃花木耳、花椒大料、糖果布匹、花生瓜子概莫能外，自行車要票，縫紉機要票，手表要票，火柴、肥皂都要票？

充分經歷了左右兩個方向的徹底實踐，可以理解，“兩手都要硬”，是不能走偏鋒，求極端，要的是中華文化的最高境界，左右適度的中庸之道。“治大國如烹小鮮”，此之謂也。拿捏火候的分寸，過一點老了，缺一點夾生。電視片中有人感慨當年的“三自一包”，說如果能夠從60年代一路堅持下來，農民的生活注定比今天更富裕。值得思索的問題是如何堅持下來？當年經濟剛剛恢復，劉少奇就發動“四清”運動，放到今天，豈不是典型的“老左反改革”？比起“大躍進”後期的浮腫病，廣大農民的生活水平今非昔比。但是，統計數據顯示，打上每年的物價指數，從1985年以後，農村居民的收入增長幾乎停滯不前了。2004年，

包括富得流油的大邱莊、小劉莊、華西村、韓村河、長江三角洲、珠江三角洲，加上賣煤賣地“農家樂”，中國農村人均收入 2936 元。按一美元兌 8.1 元人民幣的匯率折算，與國際慣例接軌，全體屬於日均不到一美元的赤貧人口。

中庸之道不等於沒有無比堅定的政治方向。窮人或相對而言的窮人，永遠是人口中的大多數。每一個共產黨員，都是面對鐮刀斧頭宣過誓的。共產黨執政的天下，工人、農民淪為無助的“弱勢群體”，明顯具有挑戰性的理論意義。回顧老一輩革命者靠人民的支持奪取政權，建設新中國的經驗，在市場經濟條件下，人民需要工資收入祇抽得起“大前門”香煙的“平民主席”。學習踐行“三個代表”，共產黨必須為民執政，代表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。否則，按劉少奇的話：“革命不是白革了？”

三、放活民生，狠抓“國計”

在民族振興的問題上，“發展是硬道理”不等於說“掙錢是硬道理”，“發家致富是硬道理”。中國積弱，一盤散沙。過去歷史上，可能的和平環境裡，勤勞節儉的中國人，開餐館都能過得小日子殷實富裕。風調雨順，無為而治，天下太平。鴉片戰爭以後，再也沒有這樣的可能了。李鴻章大聲疾呼“數千年來未有之變局”，提出躋身世界民族之林，非強國無以存活的歷史任務。³

從 156 個大項目到電視片裡所有振奮人心的產品鏡頭，除了房地產煥發出來的高樓大廈（靠國家貸款），統統不是民營、私營、合資企業以及跨國公司市場調節的偉大成果。電視片裡有劉

³ 李鴻章：〈籌議海防折〉，石泉：《甲午戰爭前後之晚清政局》，三聯書店 1997 年，第 5 頁。

少奇 70 年代組建托拉斯試點的故事。成立大企業集團，開展企業之間的競爭，比部門行政管理更貼近經濟實際，是劉少奇考慮問題的一個出發點。同時，更具意義的時代背景是，歐洲國家戰略產業的國有化浪潮和蘇聯東歐的托拉斯浪潮，目的都是擴大企業規模，發揮規模效益，與美國大企業的效率優勢相抗衡。

實踐證明，農村聯產承包責任制適合中國傳統的小農經濟。飯館、理髮店、修鞋店、小商店等服務性行業，沒有必要統統國有國營。縣辦國營、街道辦集體企業的改革，完全可以多種形式。但是，軍工、石油、大化工、鐵路、造船、航空等等這些過去沒有的戰略產業，在帝國主義列強瓜分全球資源，割地賠款沒完沒了的背景下，靠民營企業市場調節，是調節不出來的。所以，156 個大項目，自主開發的兩彈一星，是共產黨鬧革命的歷史合法性依據。否則，理論邏輯上，共產黨就成了簡單的殺富濟貧，這段歷史就成為多餘的彎路，當初就應當繳械投降，幫忙蔣家王朝搞好資產階級民主革命。臺灣的“經濟奇蹟”證明，祇要條件改變，國民黨也能搞土改。“平均地權、節制資本”，本來是三民主義的題中應有之意。祇有共產黨領導中國走社會主義道路，發揮出史無前例的動員力量，不僅推翻三座大山，而且用最短時間實現了工業化，完成私營企業市場調節（包括臺灣的“經濟奇蹟”）無法企及的歷史任務。

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今天，軍工、石油等戰略產業，就是在美國，也一刻離不開國家的導向、扶持、輸血和管控，仍然是政府高度介入的“國計”。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，像日本、南韓一樣，需要政府更廣泛的產業領域深入參與。更何況，中國從來不是列強刻意幫助的國家，而是“巴統”嚴密防範的對手。如今，割地賠款的國際環境並沒有發生本質變化。東歐易幟、蘇聯解體

之後，共產黨中國面臨史無前例的挑戰。不抓強國，單講富民，注定走不了多遠。東部沿海“兩頭在外”大進大出，參與國際分工，石油、鐵礦等高度政治化的傳統資源越來越依賴進口，13億人口的中華民族，和平崛起不可避免觸及到列強的既得利益，尤其是爭奪壟斷性戰略資源和國際市場的緊張關係。不強國，人家早晚都琢磨著把你給分了！

這20多年，西方軍工和重化工業技術進步突飛猛進，企業規模越兼併越大，戰略產業高度集中，研究開發大規模投入。連波音和麥道都合併起來，阿爾斯通也出入兼併大潮，電腦、IT產業、銀行的合縱連橫就更不足為奇了。市場競爭全球化，企業兼併全球化，中國市場化改革開放，組建大企業集團，振興軍工和戰略產業，是生死存亡的緊迫任務。老一輩辛辛苦苦建立的重工業基礎，包括軍工、重型機械、造船、航空、航太、大型設備等等一般發展中國家難以企及的生產能力，應當發展壯大。在放活民生的同時，狠抓戰略產業之“國計”，是經濟建設方針上，捲旗不繳槍的標誌性體現。

四、求真務實，強國富民

當前，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幾乎所有辦公室裡，都掛著毛澤東的題詞：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，艱苦樸素的工作作風，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。⁴ 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是求真，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是務實，艱苦樸素的工作作風是本色。求真的政治方向越堅定，可能採取的戰略戰術越靈活；戰略戰術越靈活，越要堅定求真的

⁴ 1938年6月，毛澤東為抗大寫的題詞（《毛澤東手書真跡》上卷，西苑出版社1998年，第433頁）。

政治方向。越王勾踐臥薪嚐膽，低三下四到給夫差嚐大便的程度，反而煥發出強國富民的同仇敵愾。共產黨人所求之真，是為人民謀利益。韜光養晦，是為了有所作為。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目的，是廣大人民共同富裕，實現中華民族強國富民的偉大振興。

在這個政治方向的實踐探索中，過分理想主義，容易浪漫激進，——偏左；過分實用主義，可能拉車不看路，——偏右。艱難複雜的實踐探索中，無論左右，真理往任何一個方向多走一步，都可能變成謬誤。務實忘了求真，定會遷就迷失方向的投降；求真忽略務實，勢必遭受事與願違的挫折，甚至讓人民付出慘痛代價。

在第一線實踐決策加理論探索，搞得不好，很容易兩頭不落好，裡外得罪人，不僅需要大公無私、敢於承擔責任的勇氣，而且需要政策界線拿捏得恰到好處的智慧，這就離不開屈己從人、任勞任怨的境界修養。正所謂惟大英雄能本色，極高明而道中庸。中國共產黨建設社會主義社會的中庸之道，不能裝糊塗，打哈哈，和稀泥，當老好人，而是兩手都要硬——左右開弓，既防“左”又反“右”，“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”。⁵

回顧建國以後，劉少奇傾全力推動全面工作的同時，一方面狠抓 156 個大項目、兩彈一星、大托拉斯，用國家政權的力量，建立和壯大戰略產業；一方面在城市安撫資本家開工生產，在農村大搞“三自一包”，“四大自由”，用市場經濟的辦法，解決老百姓吃飯穿衣；一方面扎根串聯，四清四不清，嚴懲奸商投機倒把，反對幹部多吃多佔；一方面反復提倡黨內民主，積極推動社會法制建設……。

⁵ “子曰：舜其大知也與，舜好問而察邇言，隱惡而揚善，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，其斯以為舜乎”（《中庸》右第五章）。

劉少奇的主張和實踐，反映出兩手都要硬的客觀要求。這可能是劉少奇建國實踐中，時而表現出“左”、時而表現出“右”的根本原因。也是文化大革命期間，過去偏“左”偏“右”的老幹部，絕大多數站在劉少奇一邊的根本原因。是天災人禍餓殍遍野，讓劉少奇痛心疾首，下定決心，死不悔改，堅持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。⁶ 同樣，是十年浩劫滿目瘡痍，讓中國人民痛定思痛，毅然決然，一百年不動搖，堅定求真務實的指導原則，走向新時代！

究竟什麼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？抽象概念化的理論爭論曲折婉轉。從建設新中國的直觀看問題，能夠帶來民族振興的產品，是軍工、石油、三峽、大化工、飛機、造船、重型機械、大型電網電廠，是鐵路、航運、電訊、環保等遍及各地的大型基礎設施，是由南水北調全面展開的西部大開發。日本、南韓的經濟振興，靠的是政府扶持的大企業。雖然已是不同於西方的東亞模式，畢竟還是資本主義私有產權。中國戰略產業的脊梁骨幹，從蘇聯援建 156 個大項目開始，發展到“兩彈一星”為代表的完整體系，靠的是國有國營的自主開發，靠的是“有條件要上，沒有條件創造條件也要上”的鐵人精神。在取得巨大經濟成功、人均 GDP 已六七倍於昨天的今天，我們在繼續提高效率之時，是否要給付出巨大代價的“弱勢群體”和流血流汗的勞苦大眾“分分紅利”了呢？在公平致富之中，我們是否需要給改革的主導中堅——國有大企業“擴擴股份”了？深化改革，以民為本，建立 13 億人共同

⁶ 包括發動扎根串聯的反對腐敗的“四清”運動，成為文化革命的序曲。在真理多走一步的關口，毛、劉之間發生了有史以來最嚴重的一次公開對抗。在以後打倒劉少奇的運動過程中，除了極少數名不見經傳的投機分子，絕大多數老幹部跟不上形勢，統統被打倒。

小康的和諧社會，恐怕沒有比這更突出、更重要的內容了。

一大二公，普遍貧窮，不是社會主義。一盤散沙，唯利是圖，也不是社會主義。在市場經濟搞活民生的基礎上，在對外開放的國際競爭中，煥發國有大企業的新生，就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。捲旗不繳槍還是繳械投降，淪落成胡傳魁式“有槍便是草頭王”的實用主義，這就是試金石。求真務實，堅定為人民服務的政治方向，堅持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，一手放活“民生”，一手狠抓“國計”，強國富民的歷史任務統籌兼顧，是我們應當持續探索的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。

感謝張木生為本書寫〈引子〉，⁷ 並提供 1981 年的文章作為〈序言〉。⁸ 感謝王小強，同意把 1979 年的文章當成本書的〈後記〉。⁹ 張、王二位，曾為改革開放的先鋒“智囊”。在那時的政治氣候中，他們“右”得夠嗆，現在似乎又“左傾”了，我想這完全符合歷史的辯証法。用張木生的話說，無論當時文章寫得怎樣，我們獻身改革開放，不是向帝國主義和資本家投降；我們參與撥亂反正，不是返回蔣家王朝、美帝慣例，而是重返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之正；我們倡導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，昨天的初衷，今天的目的，始終一貫，都是要堅定為人民服務的政治方向。恐怕沒有人會撿回文革的口號和大棒。我們今天的“左傾”，是為了深化改革、完善制度，繼續中國社會主義道路的探索，在“左”的方向上防止重演文革悲劇，在“右”的方向上避免重蹈蘇聯東歐解體易幟的大災難！

⁷ 張木生：〈劉少奇的新民主主義階段論與列寧的過渡學說〉。

⁸ 張木生：〈學習列寧的過渡學說，肅清左傾流毒〉。

⁹ 王小強：〈農業社會主義批判〉。

電視片的製作和這本書的寫作修改，從頭到尾，是一個集體參與的創作過程。衷心感謝何家棟（原工人出版社副社長）為電視片和劇本的寫作，投入巨大精力，並為本書寫了〈校閱後記〉。¹⁰ 衷心感謝薄一波（原中央顧問委員會副主任）、谷牧（原國務院副總理）、劉傑（原二機部部長）、楊波（原輕工業部部長）、吳冷西（原新華社社長）、于光遠（原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）等與父親在不同時期共過事的老同志，和身邊工作人員。衷心感謝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王漢斌、中央聯絡部部長戴秉國等在任領導（當時）和史學界、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的老師們、同志們。衷心感謝《中國青年報》記者郭家寬、部隊作家海波、武警出版社副社長李安東、武警影視中心周家戎和幾家劉少奇紀念館的朋友們，積極參與和投入本書寫作與電視製作。

本書的寫作修改，認真學習和參考了楊尚昆（原國家主席）、薄一波（原中央顧問委員會副主任）、鄧力群（原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）等許多老一輩的回憶和評述，在此表示衷心感謝。

感謝香港東海集團董事長黃楚標獨家贊助電視片製作。感謝香港大風出版社為本書出版所做的編輯工作。

¹⁰ 何家棟：〈《劉少奇與新中國》校閱後記〉。